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一期
2013 年 6 月　　頁 277~31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

高　嘉　謙*

提　　要

1916 年，避居香港九龍的遜清遺民陳伯陶（1855-1930），注意到了宋末二帝在香港九龍地區留下的史蹟，並對宋王臺及周邊遺跡的來歷加以考據和發揚，招引文人登臺雅集，詠懷抒志，成爲民初香港值得注意的遺民論述。詩人題詠宋王臺的詩篇，引起酬唱無數，進而由蘇澤東（1858-1927）輯錄爲《宋臺秋唱》（1917），可視爲香港地區最早的漢詩雅集刊物。從遺民文學的角度切入，亡宋遺跡和九龍避地之間形構的地方感，替我們揭示了漢詩與香港地景之間發生的意義脈絡。文人筆下的歷史敘事和抒情詩學，在英殖民地和殖民體制下，有效開展出香港文學獨特的遺民空間。詩人置身九龍，藉由漢詩表徵的「地方」（place）與九龍宋史「地景」（landscape）的建構，二者之間的辯證和糾葛，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漢詩系統內，建立了香港離散詩學的參照脈絡和意義。

關鍵詞：宋王臺、《宋臺秋唱》、陳伯陶、清遺民、九龍宋史

本文於 101.08.21 收稿，102.06.18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dherents' History in Stone: *Autumn Chants on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and the Landscapes of the Qing Dynasty Adherents in Hong Kong

Ko Chia-Cian*

Abstract

In 1916, Chen Botao (1855-1930), an adherent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has taken refuge in Kowloon, Hong Kong, is drawn to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Sung Wong Toi) , a historic site left by two Song Dynasty emperors. He then starts to study its history and its surrounding historic sites, as well as invites other intellectuals to ascend onto the terrace, gather together, and produce literary works about it. Notably, these writings can represent the Qing Dynasty adheren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 Zedong (1858-1927) later compile the poems among them into the *Autumn Chants on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Song tai qiu chang*](1917),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arliest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ms written in literary gatherings in Hong Kong at that tim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historic sit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Kowloon as a shelter form a special space in which scholars are able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ed meaning between Chinese poetry and Hong Kong landscapes.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poetics lead into a unique arena of adherent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lace" presented in Chinese poe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cape" in Kowloon's Song Dynasty history establishes a context for diaspora poetics in Hong Kong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Sung Wong Toi),**
***Autumn Chants on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Chen Botao, adher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n Kowlo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

高　嘉　謙

一、地域文化與遺民空間

辛亥鼎革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誕生了一批遜清遺民，卻是歷代以來相當特殊的遺民群體。這批遺民群體面對的不僅是政權易代，而是帝國的崩毀，更是一個現代情境下面對傳統生命的分崩離析和證成接續的兩難處境。其中不少遺民追隨十九世紀末以來的華人大遷徙潮流，選擇去國離鄉。無論躲避動亂紛陳的政局，或難以面對新興政權，他們避地外國異境或殖民地，迥異的生活景觀與文化氛圍改造了傳統定義下的遺民脈絡。士人群體體驗的飄零感傷除了間接回應古典遺民論述，更重要的是面對時間與地理急速變化的現代衝擊，士人轉向一種地域性的身分認同或抵抗。遺民有了新的姿態和表徵意義，他們不再是絕對的政治道統守護者，而是堅守與想像傳統的廣義文化主體，表現出新時代來臨的現代性體驗。

在中國文化史上，作爲邊陲、化外之境的嶺南區域長期是流人遷徙、官宦

* 本文爲國科會 99 年度研究計畫（NSC99-2410-H-002-235）之部分執行成果。初稿〈遺民與地景：陳伯陶和《宋臺秋唱》〉曾宣讀於「第二屆亞洲華人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臺北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11 年 11 月 5-6 日。感謝友人黃念欣教授協助影印資料和提供意見，以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給予的肯定、專業意見和指正，筆者受益不少，已盡力調整回應，在此一併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貶謫、遺民流亡之地。這漫長的歷史形塑了嶺南的獨特地域文化，邊緣意識與異域景觀。但南方有著遠離政治中心，躲避戰禍與流放罪官的背景，使得南方地理因此成爲蠱惑的空間，弔詭的邊境。但比起嶺南，開發更晚的香港和澳門更是處在華夏版圖的邊緣之外。從十九世紀以降，香港和澳門分別淪爲英國與葡萄牙的殖民地，更是成了廣東一帶的內地難民和士紳躲避戰禍的域外之地。但辛亥革命後，不少遜清士紳流寓和移居到港澳地區，這些士大夫群體具備豐厚的傳統教養和文化意識，對應已在港澳地區落地生根卻亟需傳統文化教育的同鄉紳商，傳統文人因此處在一個相對保守和受到重用的客觀環境，他們的生存空間與文化活動，一代又一代的文教傳承，由此成爲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

從香港和澳門文化史及文學史的發展而言，這些自辛亥革命後進入港澳地區的傳統文人，羅香林教授指出這是中國文學在香港發展的第三期階段。雖然香港和澳門分屬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兩島地理過於接近，基本都是由廣東士紳組成社會的文化階層。因此，傳統文人往返或定居兩地屬常有之事，兩地的文學發展也有重疊之處。從 1912-1926 年間，流寓港澳的遺民文人被歸納爲「隱逸派」。[1] 隱逸派遺民詩人的進駐代表了古典詩學的復興和延續，卻同時明確形成了一個舊文學播遷與文化深耕的契機，且逐漸朝向了一個在地脈絡的文學生產轉向。這些隱逸派人士包括陳伯陶、賴際熙、張學華、吳道鎔、何藻翔、丁仁長等人，詩詞創作與酬唱不減，均有詩文集傳世。他們的詩文無論抒發去國懷鄉之情，或針貶時代潮流中的史事，建立了港澳古典文學的基本規模。另外更有商人士紳陳步墀獨資編纂刊行《繡詩樓叢書》30 餘冊，更象徵了港澳古典文學傳統的生命力展現。

除此，有些遺民文人投入建構地域文化的歷史記憶，編纂廣東遺民錄與縣志等地方文獻資料，追認港澳歷史遺址。帝國崩壞而邁入民族國家秩序，封建的政治道統消亡，政治遺民的正當性削弱，古典遺民論述理應失去對應的條件。於是這些定居港澳的遺民文人的歷史書寫，著眼的反而是廣東地域文化的

[1]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第 6 章〈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梳理和論述，透過對地方意識與歷史記憶的編纂和重構，意圖重塑嶺南宋、元、明三代遺民正統，凝聚地域文化的歷史軸心。儘管政治道統難以逆轉，他們的歷史敘事，甚至更延伸到對港澳歷史遺跡的重述，寄託遺民情懷之際，他們等於在個人的避難存身之處形構遺民的主體性。這同時勾勒出避居殖民地所營造的遺民空間，有著一種特殊的地方（place）[2] 認知與地域文化意識。

本文以避居九龍的陳伯陶（1855-1930）爲對象，他對宋王臺及周邊遺跡的歷史來歷的考據和發揚，招引文人登覽宋王臺的遺民雅集，成爲民初香港值得注意的遺民論述。詩人題詠宋王臺的詩篇，引起酬唱無數，進而由蘇澤東輯錄爲《宋臺秋唱》（1917），成爲香港地區最早的雅集刊物。在遺民眼界底下，亡宋遺跡和九龍避地之間形構的地方感，如何藉由歷史敘事和抒情詩學，在英殖民地和殖民體制下，有效開展出香港文學脈絡下的遺民空間。詩人置身九龍所認知的「地方」與九龍宋史「地景」[3]（landscape）的建構，二者

[2] 「地方」（place）作爲觀看、理解和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觀念。「地方」以觀者位居其中，進而定義、命名、投注和附著意義，關係到我們選擇思考「地方」的方式（或強調，或貶抑什麼），具備日常特徵，爲生活提供意義。地景（landscape）則是強烈視覺觀念，觀者位居地景之外，涉及觀看的事物和方式，那是人類主觀經驗所間接反映的外部世界，是一種在社會與文化條件下理解、感知的產物，具有其自身的技術和結構形式。而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乃相互定義的詞彙。前者標示出以「經驗」爲機制的主觀的空間感及時間感，其傾向安全、穩定、靜止。後者則相對抽象、開放、客觀及處於動態，具有分析性特徵，容易跟社會科學展開對話。「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參見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 年），頁 4。（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年），頁 16-22。（英）伊恩・D・懷特著，王思思譯：《16 世紀以來的景觀與歷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 年），頁 1-20。

[3] 英文 Landscape 或德文 Landschaft 在人文地理學脈絡裏，一般譯爲地景或景觀，兩種譯法常見於不同中文著述。從 16 世紀最初以義大利和荷蘭畫家視其爲風景的代表，到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透過不同學科深入其與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變革與社會結構關係的聯繫， Landscape 的研究，往往涉及各種社會過程。「那是一個社會關係與自然世界在此過程中相互建構在可見景色、生活空間及受控領土的形成中」，進而引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間的辯證和糾葛，值得探究。以上面向，不僅是遜清遺民生態和書寫的考察，也同時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地域漢詩系統內，建立了香港離散詩學的參照脈絡和意義。

二、宋王臺：遺民與遺跡

1938 年南來香港的葉靈鳳（1905-1975），是少數幾位在香港定居直到病逝的著名五四作家。儘管是外來移民的身份，葉靈鳳早在四十年代開始在《星島日報》開闢「香港史地」專欄，從實地調查和文獻資料入手撰寫系列關於香港地區在英殖民之前的山海史實，歷史變革和香港方物，以及殖民地下的早期社會現象，並於 1958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香港研究著作《香港方物志》。在這些屬於早期「香港學」的文章裏，葉靈鳳同樣注意到了宋末二帝在香港九龍地區留下的史蹟，並有幾篇文章考據文獻，細述來龍去脈，同時記錄了宋王臺以及周邊史蹟如何在陳伯陶等遺民的歷史考證和文學創作下，成爲顯著的歷史地景。[4]

然而，作爲五四文學世代的葉靈鳳，不見得可以理解陳伯陶等人當年對宋

出了認同的表徵或衝突的議題，包括種族、階級和性別等範疇。其中 Landscape 的規訓特徵（disciplinary aspect）更觸及民族國家在自然、殖民、後殖民等複雜面向的強大作用。由於 Landscape 觸及多元面向，因此本文同時兼用兩種譯法，最大的考量是顧及不同段落的不同關注重點，以及在中文修辭和上下文的閱讀效果。因此對於以 Landscape 精確表徵地理學或建築學意義的凝視與限制視點，全文統一用「地景」一詞。而部分句子沿用「景觀」一詞，對應的是文化與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學脈絡觀察。Landscape 涉及的複雜面向，參見（英）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景觀和歐洲的視覺感——注視自然〉，凱・安德森、莫那・多莫什、史蒂夫・派爾、奈杰爾・斯里夫特主編：《文化地理學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70-388。關於 landscape 在西方英文、德文、法文脈絡的定義和演變，參見黃冠閔：〈風景的哲學思路〉，發表於臺南藝術大學主辦：「文與體：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2012 年 6 月 25-26 日。

4 葉靈鳳的相關篇章爲〈官富場與官富山〉、〈宋王臺巨石的滄桑〉、〈港九的南宋史蹟〉和〈南宋二帝陵之謎〉。以下文章均收錄於葉靈鳳：《香島滄桑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遺跡考證和寫作的種種作爲。他有一段文字寫到：

> 那時有一班清朝遺老住在九龍作寓公，各人宦囊猶裕，做官刮來的錢還未用完，便「恥食周粟」，在香港與一些文士詩酒唱和，又交結一些附庸風雅的有錢商人。他們爲了要表示故宮禾黍之思，便寄情於九龍一帶所留下來的當年南宋小朝廷的史蹟。[5]

顯然葉靈鳳著眼的是宋王臺對遺老們的意義，而沒有意識到陳伯陶等人發揚宋王臺遺跡對香港地域和文學的價值。在今天眼光看來，二人同樣南來避難，葉靈鳳對香港史地的興趣和考證，隱然呼應了辛亥鼎革南遷的陳伯陶，他們都在時代亂離的背景下，展開對自身流離地域的某種觀察和認識。箇中差異在於葉靈鳳是爲謀生而替報刊撰寫專欄文字，陳伯陶則以遺民眼界，透過詩文的歷史敘事和言志抒情，完成各自對這個英殖民島嶼的前身來歷的考察。但無論對香港史和香港文學而言，二人都可以看做「書寫香港」的先行者，[6] 陳伯陶兼具史家和詩人筆觸的舊體文學寫作，和葉靈鳳的香港掌故文章，都銘刻了香港地域的歷史縱深和滄桑。尤其作爲不同世代的離散者，二人的書寫位置，對於香港「土地」的辯證及勾勒，相對 1980 年代以後獨樹一幟的香港城市文學，卻鮮明標誌了他們在香港文學的特殊意義。

陳伯陶（1855-1930），字象華，號子礪，原籍東莞。師從陳澧，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和雲南、貴州、山東鄉試副考官。1905 年入直南書房，1906 年赴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後出任江寧提學使和兩署江寧布政使。後見時事日非，以老母多病，終養歸里。1911 年出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辛亥革命前後，他頓感時局混亂，對國勢前景悲觀，日後回顧仍批判「辛亥革軍興，寇攘藉姦宄，人心既瓦解，天

[5] 葉靈鳳：〈宋王臺巨石的滄桑〉，《香島滄桑錄》，頁 179-180。

[6] 同樣在 1930-1940 年代左右在香港報刊《華僑日報》、《南強日報》寫作香港新界史地資料的作者，尚包括黃佩佳、吳灞陵等人。南來作家兼學者許地山在香港期間（1935-1941）也曾發表〈香港與九龍租地史地探略〉、〈香港小史〉及〈香港考古述略〉等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命豈顧諟，大盜總師干，移國不旋踵，痛哉！」[7] 其時廣東的革命軍謠傳帝京陷落，致使兩廣總督張鳴岐奔逃，最終革命軍蔓延，陳伯陶困邑城三日後，攜老母避難香港九龍城，隔年弟弟病故，母親吐血復發，亂離中憂患重重。他在九龍居所稱「瓜廬」，有效仿東陵種瓜之意，[8] 詩多避世隱逸之感，自號「九龍眞逸」。他曾抗拒粵督軍龍濟光、省長張鳴岐的利祿誘惑，決心著書見志，先後編纂了《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明季東莞五忠傳》、《廣東省東莞縣志》、《羅浮指南》等地方性文獻，藉由重構嶺南遺民系譜，張揚地域文化的歷史意涵，人稱陳太史。除此，陳伯陶在香港研究宋史遺事，考證宋季二王在九龍史蹟，並於宋王臺遺址追薦宋遺民趙秋曉生日，與遺老友好題詠酬唱宋皇臺懷古等詩，後有《宋臺秋唱》的結集出版，以及《瓜廬詩賸》、《瓜廬文賸》、《孝經說》、《陳文良公集》。陳伯陶以遺民自處，跟其他居港遺老往來熱絡。他們書寫以甲子或清年號紀年，重要節日穿前朝官服，溥儀大婚仍不忘邀集居港遺老進獻祝賀，更喜歡在九龍城宋王臺雅集聚居，仿明遺民謁陵姿態，處處彰顯遺民形跡，成爲民初香港頗具凝聚力的文人圈。其中值得注意，還是他們在文教傳播的使命與貢獻。除了編撰、整理地方文獻，陳伯陶與賴際熙等人合辦學海書樓，擔任教席，奠定了殖民地香港早期的中國文化與文學教育基礎。他們保存國學、推動傳統道德教化，促成了香港大學體系內的中文學院成立。[9] 再者，這些遺老們都寫得一手好書法，他們的書法創作和鬻書謀生，在二十世紀初香港書壇形成別具一格的遺老書風。[10] 遺

7 陳伯陶：〈七十述哀一百三十韻〉，《瓜廬詩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68-269。

8 邵平爲秦國東陵侯，秦亡後不出仕，爲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見《史記》之〈蕭相國世家〉。

9 關於居港遺老與香港中國文化教育的關係，參見區志堅：〈學海書樓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收入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頁 79-124。

10 參見張惠儀：〈粵籍遺老書法家與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書壇〉，收入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頁 145-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老們的雅集習性和題詠揮毫，無形中帶動了更多文人雅士的參與，間接促成「北山詩社」、「正聲吟社」等多個香港傳統詩社的成立。

陳伯陶對九龍地區跟宋史連結著力甚深，其中又以宋王臺遺跡的保存和發揚最爲顯著。事實上，從宋王臺最早出現於史籍文獻到眞正成爲宋史遺跡而廣爲人知，有著曲折卻有趣的發展。目前可見宋王臺登載於史籍的文字，當屬清嘉慶年間修纂的《新安縣志・勝蹟略》（1819）記載：「宋王臺，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昺駐蹕於此。臺側巨石舊有宋王臺三字。」[11] 寥寥數語，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卻留下末代宋帝的最後身影。而今巨石上的「宋王臺」三字旁，刻著「清嘉慶丁卯重修」（1807），意味亡宋遺跡似乎在清代重啓意義，儘管沒有確切的文獻材料證明石刻最早在何時出現。宋王臺位於官富場附近的一座小山丘，有「聖山」之名。官富場在明清兩代因產鹽而得名，接近於今日的九龍城地區。[12] 而早在 1840 年左右開發的九龍城寨，跟宋王臺位處的聖山不遠。儘管有清廷駐寨官員，也未見他們將此地跟宋史牽上關係，而當地的侯王廟僅屬清廷官員入鄉隨俗的「酬謝神恩」。於是，宋王臺明確走入宋史的範疇，則要到 1898 年，香港已進入英殖民統治 50 年。當年中英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人取得新界租地，展開了九龍和新界土地的開發和規劃。華人領袖何啓從在殖民地政府擔任要職的德國人歐德理（E.J. Eitel）的香港歷史著作《歐洲在中國：從開始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1] 劉智鵬、劉蜀永編：《《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15。

[12] 官富場的範圍頗廣，今日九龍灣內沿岸平地皆在內，包括九龍城北一帶，即土瓜灣至九龍城太子道等地，而九龍塘以至九龍城以南，也在範圍內。詳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 年），頁 77-78。官富場作爲鹽場的歷史沿革，參考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8-53。歷來詠官富場的詩歌並不少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獲悉九龍地區的宋史遺跡，[13] 並在立法局提議英殖民政府立法保護遺跡。「宋王臺保留法案」（Sung Wang Toi Reservation Ordinance）最終獲得通過，禁止在此採石。有趣的是，立法會議的紀錄清楚記載中英議員都同意香港是年輕的殖民地，需要「令人崇敬的歷史光環」（respectable halo of antiquity）。[14] 20 世紀初期港英政府地圖以“Sacred Hill”標示「聖山」，將原始語境「聖上」擴大理解爲「神聖不可侵犯」，賦予更厚重的歷史氛圍和文化意涵。[15] 言下之意，宋王臺作爲表徵南宋史事的物質性遺跡，替港英政府完成了歷史的建制和功能。這段經由外國人將華南流傳的宋史傳奇與宋王臺相連的文獻紀錄，竟然因緣巧合的將宋王臺推上了帶有「紀念性」（monumentality）的法定遺跡。[16] 宋史、遺跡和殖民地自此產生了微妙的激盪和聯繫。

但九龍與宋史的密切關連性，卻要到辛亥鼎革後，經由南遷遺民陳伯陶等人的文獻考證和創作，才完成了最爲關鍵的歷史追認和地域連結，尤其以營造宋王臺作爲「紀念性」遺跡的文化氛圍和古典光暈，最是引人矚目。陳伯陶介入宋王臺的歷史論述契機，始於宋王臺被視爲爲法定遺跡十數年後的 1915 年，工務局認爲宋王臺山下土地遼闊，宜劃定地段，出投變售。此事因建築商李瑞琴獲悉，急忙告知南來遺老賴際熙、陳伯陶等人，眾人努力奔走於港府官員和總督，最終協商結果乃由官方劃出地段數畝，定爲疆界，李瑞琴捐建石欄

[13] 歐德理於 1879 年加入香港政府任職督學，協助港督軒尼詩推動華人政策。任內完成的《歐洲在中國》著力發掘香港境內的遠古歷史，首次將華南流傳的宋史傳奇與九龍宋王臺聯繫起來。而歐德理對宋史傳說的理解，大抵跟他擔任《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的編輯，閱讀過相關洋人的考證文章有關。參鍾寶賢：〈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 17-18。

[14] 議事紀錄乃轉引自鍾寶賢：〈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 14。

[15] 宋王臺乃幼帝趙昰登基後駐蹕之地，大臣以「聖上」稱之，故有「聖山」之名。參見饒久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香港： 天地圖書公司，2011 年），頁 274-279。

[16] 關於中國古代建築的紀念碑意義的討論，參見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磴道，建立牌坊，讓遊人可拾級登覽，保留古蹟。[17] 陳伯陶特爲此撰述〈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18] 考證史籍文獻，詳述宋王臺乃年幼的宋末二帝駐蹕之所，他們爲躲避蒙古大軍的追擊，一路逃往南方，輾轉來到九龍官富場，停留約六個月。其時益王昰（廟號端宗）已先在福州被群臣擁登大位，是爲端宗，[19] 改年號景炎。雖是逃亡，但畢竟是帝王的尊貴身分，短暫的半年時間，陳伯陶考證此處已建立行宮，並強調「宋之君臣擁旄北望，必有呼渡河與直抵黃龍者焉」，氣勢未歇，且宮室已成，「千乘萬馬，散居山海間，其艘艑之輻湊，衢路之填委，郵傳之交午，饟道之絡繹，櫛比鱗萃，雖不比汴、杭故都，亦必成一都會焉。」這等氣勢難免有粉飾誇大之嫌，卻成功替此宋王臺遺跡營構輝煌的歷史前身。

但帝王遺跡不僅僅於宋王臺，他考據《新安縣志》得出，宋王臺附近的上帝廟就是行宮舊址，旁有名爲二王殿的村落，就是史實的佐證。同時一併提出晉國公主墓，乃端宗昰生母楊淑妃的女兒，死於溺而鑄金身以葬。最後更考證九龍城寨附近香火鼎盛的侯王廟，就是爲紀念護駕有功的楊亮節。楊亮節乃端宗昰生母楊淑妃的胞弟，宋季一代忠臣。換言之，宋王臺、行宮、公主墓、侯王廟，有形的遺跡，賦予了末代宋史紀實的物質性基礎。雖然陳伯陶親眼見證的僅有宋王臺的巨石和侯王廟。行宮、二王殿村和公主墓僅存遺址的傳說，卻無損於一個亡宋遺跡的「文化景觀」的構築。陳伯陶和遺民文人群體自此遊覽宋王臺兼及詩文題詠，更以詠史和抒情筆觸，穿梭於以上焦點地標，發思古之幽情，以歷史和文化的氛圍完整奠定了九龍的宋史脈絡和面目。

---

17 關於保存宋王臺遺址的過程，詳陳伯陶弟子李景康：〈紀賴際熙等保全宋皇臺遺址〉，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頁 264。

18 陳伯陶〈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最初收錄於文集《瓜廬文賸》（1930）。參見陳伯陶：《瓜廬文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13-215。

19 端宗乃益王趙昰的廟號，他在位期間僅短短兩年（1276-1278），享年 11 歲。由於端宗在逃亡途中遇溺，驚病交加，病逝於碙洲。而同父異母的弟弟衛王趙昺即位後，改元祥興。後元兵追擊，一行人逃亡至新會厓山，見大勢已去，丞相陸文夫抱著宋帝趙昺投海殉國，宋朝滅亡。趙昺在位僅十個月，享年 8 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伯陶的碑記最終因李瑞琴的病逝和人事變遷而未及刻石，但碑記本身可以看做勾勒九龍與南宋歷史線索的重要索引，雖然內文核心的標誌是宋王臺。宋王臺是具體的紀念碑體想像的物質形式，其合法性的確立經由文化和歷史光譜的渲染，並擴散至其他周邊相似性質的遺跡，這些得以佔據遺址座標的歷史標的物，重塑了九龍景觀，九龍的「地方」意義，以及遺民群體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已在改變。[20]

九龍宋史與遺民論述的關連性，則隱然啓動。陳伯陶除了是避居九龍的前清遺民，他與這片土地還另有歷史淵源。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21] 中方簽約代表是李鴻章，其時陪同見證簽約儀式的，還有時任資政大臣、國史館總纂的陳伯陶。[22] 條約內容乃將新界及周邊島嶼租予英方，爲期 99 年，自此香港殖民地政府即發展與九龍半島的接壤處，形成我們後來熟悉的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爲殖民地香港版圖的全貌，也奠定了日後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時限。辛亥後陳伯陶避居九龍地區，時而登臨眺覽的宋王臺遺跡，就是座落在條約簽訂後英國人擴大管轄和發展的九龍城一帶。當年宋王臺藉由殖民政府立法保護，得以從埋沒的歷史遺跡中浮現，無意間替殖民地香港保存了一個中原歷史的遺址。爾後陳伯陶考據宋王臺歷史，揭示末代宋史在九龍的相關遺址，並聚集遺民文人賦詩唱詠。遺民文人致力維護

[20] 一個具體的案例，包括 1904-1922 年間九龍填海工程後，港府在新闢土地發展華人社區，爲吸引新移民入住，刻意以安街、宋街、帝街、昺街命名街道。相對當時香港大部分以英籍港督和官員名稱爲街道命名，這種對九龍「地方」意義的重塑卻是非常明顯。1960 年在宋王臺原址附近新闢的宋王臺公園，街道也命名爲「宋皇臺道」。陳伯陶等前清遺老對九龍宋史的建構，不僅連接了港人對香港和中原歷史的認識，也確實改變了英殖民政府對九龍地域的認知。關於街道命名的口述記憶，參見鍾寶賢：〈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 24。

[21] 關於簽署此條約的討論，詳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22] 此段史實基本未見於陳伯陶的生平紀錄，卻在其孫子陳紹南整理的陳伯陶圖片集中發現這張簽約後合影的歷史照片。參見陳紹南編：《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香港：Auto Printing Press，1997 年），頁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代古蹟，已非響應殖民政府替香港接續古遠崇敬的歷史光環。他們是別有用心的在賡續遺民道統。陳伯陶著名的〈宋皇臺懷古並序〉在遺民文人群體間引發唱和連連，他將石刻上的宋王臺改寫爲宋「皇」臺，聲稱石刻「宋王臺」三字乃依據宋史〈瀛國公二王附〉舊稱，稱王而不稱皇，應屬元代時人爲避諱而刻。端宗駐蹕於此，理應正名爲「宋皇臺」。陳伯陶重申宋帝端宗的帝王正統，形塑了宋王臺的「浩蕩王氣」，象徵性作爲抵禦元兵的最後堡壘。而事過境遷，遜清遺民憑弔帝王遺跡，接續漢人道統之餘，也在殖民地「見證」了中原正統。

從不平等的租讓條約，到南宋小朝廷遺跡的發揚，九龍這個歷史現場有著迥異的意義。對於陳伯陶而言，遺民眼界裏的九龍，與宋末遺史的接軌，除了文獻和宋王臺遺跡的互爲呼應，更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地方性認同。於是，距離宋王臺不遠的九龍城侯王廟，就成爲認同宋末二帝駐蹕九龍事蹟最重要的信仰機制。侯王廟興建於何時已難以考察，目前可見的最早記載是道光二年（1822）的重修碑記。廟裏祭拜的「侯王」爲何方神明，歷來也沒有明確界說。陳伯陶藉重申宋王臺的南宋史事之際，將侯王廟一併視作供奉宋帝端宗舅父楊亮節，將歷史人物置入民間信仰，以一間歷史悠久的古廟來印證和完備對宋季忠臣的供奉，同時藉由撰述〈侯王廟聖史碑記〉（1917），[23] 以考稽史實，立碑公告的姿態，集廟、碑、史於一體，完成南宋遺事的有效追認。

廟宇供奉神明既是民間信仰，也是凝聚民間情感和精神認同的標誌之一。歷來身分不明的「侯王」，在陳伯陶撰述的碑文裏，以相傳侯王姓楊的說法，逕直連接爲「南宋末忠臣，始封侯，晉封王，故稱曰侯王。余曰：此殆楊亮節也。」綜觀碑文的行文脈絡，內容臆測成分居多，並無嚴謹的歷史考證。諸如對史籍的闕漏，陳的說法：「九龍，古官富場地，疑亮節道病卒，葬於斯土，土人哀之，立廟以祀，史蓋失載也。」他爲論斷楊亮節必然就是楊侯王，以簡單的經驗法則推論：「況從二王海上，史別無楊姓者。焉有晉侯而王，烜恭如

[23] 參見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年），第2冊，頁447-4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而史闕文者乎。余固曰：此殆亮節也。」最後肯定楊亮節的忠義壯舉爲民間所稱譽，與九龍地域相連，遂言：「余謂亮節之忠，爲宋外戚所罕見。雖走死，而其英魂毅魄，血食茲土，到今不衰，有以也。」儘管以上論述多有疑義和不可靠之處，[24] 但碑記後文還有迎神、送神曲。其中頌揚：「驅颶母兮搏厲鬼，福我民兮壽無有害」（〈右迎神〉節錄）、「射旄頭兮乘箕尾，食茲土兮享於世」（〈右送神〉節錄）。結尾渲染神話色彩，回歸民間祭祀風格。碑記最後再次援引《新安縣志》，重複說明宋行宮、公主墓等遺址。換言之，楊侯王廟的追認，無異是環繞南宋二帝在九龍遺事的繁衍補充，材料的增補既豐富了南宋史蹟在九龍的意義，且透過民間信仰儀式，擴大解釋了南宋帝王事蹟被民間廣泛認知的基礎。民間信仰本來就無關信史。陳伯陶的置入性解說，替侯王廟補上前身來歷，有待確認的「史實」藉由信仰儀式獲得某種集體的認同歸附。在此意義而言，陳伯陶著力於九龍宋史的梳理和論述，無疑替一代遜清遺民在殖民地找到介入中原歷史的短暫空間。儘管這段歷史僅屬中原邊陲的南方小論述，但辛亥鼎革的重要發源地始於廣東，黃花崗起義等重要據點亦在廣東，廣東在民國史的意義舉足輕重。陳伯陶避居廣東以南的九龍，重述南宋史蹟，除了可資回應處身殖民地的夷夏之辨，卻也在民國新紀元的時代，汲取帝國想像的餘溫，接軌九龍的古代史，尤其還是漢人政權流亡南方的南宋正史。這同時可以看做廣東意識下的歷史書寫。[25]

[24] 關於楊亮節死因，另有文獻記載溺海死於厓山，並非病死。另外，在九龍、新界和大嶼山分別都有侯王廟。廣州也有不少侯王廟，乃一通稱，沒有固定祭祀的神明。這些爭議點，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詳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頁 122-174。高添強：〈九龍城地標之三：九龍城區史蹟概覽〉，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 217-223。

[25] 關於陳伯陶在香港殖民地的歷史書寫，以及其中的廣東意識，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除了九龍宋史的敘事，他同時編纂了《宋東莞遺民錄》和《勝朝粵東遺民錄》，另外還有地方誌的編纂。前二書皆屬 1916 年出版，著眼宋明兩代廣東遺民譜系的建構，同樣是遺民論述的一環。礙於篇幅，將另文處理。對陳伯陶編纂遺民錄的動機和理念，參董就雄：〈陳伯陶忠義觀試析〉，《文學論衡》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伯陶接近文化考古學的作法，其實說明了遺民傳統不是想當然爾的「正統」。文化考古的重要意義，還包括透過物質性遺跡的銘刻將歷史傳說確立爲證據，那是歷史最具份量的標誌。[26] 如此一來，陳伯陶的努力有效將宋末帝王流亡政權以種種遺跡的證據，揭示那眼前失落的政治「正統」，以不同的型態重建九龍作爲避地的傳承和正當性。嶺南遺民群聚香港、九龍殖民地，不同於散居青島、上海、天津等租借地的遺民，反而在避地與殖民地之間對遺跡和景觀有了另一層的辯證與建立。陳伯陶率先建構了九龍宋史的基礎論述，同時號召遺民文人集體題詠宋史遺跡，寄託心志，替殖民地香港形塑了一個回望中原史事和政治道統的標的物。而《宋臺秋唱》的輯錄出版，則是在另一個文學書寫脈絡下，呈現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遺民心事或遺民自我的確認。

三、石頭與詩：《宋臺秋唱》的避地論述和抒情詩學

（一）宋帝南遷：懷古的記憶

陳伯陶重申宋王臺以前，從宋以降書寫南宋末二帝南遷流亡事蹟的詩詞，幾乎均以廣東新會的厓山爲重要據點。南宋詩人筆下僅有唐涇〈厓山亡〉、文天祥〈哭厓山〉等明確指涉厓山海戰，南宋滅亡的最後場景。到了明代，南宋二帝駐蹕厓山仍屬相關詩詞寫作的重點，其中明確狀寫紀念性建築的有宋行宮、慈元廟、大忠祠、陸公祠、永福陵、楊太后陵等，仍屬厓山記憶的形塑。換言之，詩人寫作的脈絡仍以宋史記載爲主要依據，厓山是兩軍最後交戰，亡宋的地點。厓山書寫因此具有彰顯嶺南遺民文化精神的特質，歷來在嶺南文學與地域文化有著重要意義。[27] 到了清代詩人筆下，除了厓山書寫的主題外，還

[26] Tapati Guha-Thakurta, *Monuments, objects, histories: institutions of art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3.

[27] 關於宋以降的厓山詩詞書寫，相關文本參考張大年編選：《厓山詩選》（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至於厓山記憶、厓山象徵與嶺南遺民精神的建構與傳

臺灣華語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了官富山，已鄰近九龍地區。但始終沒有確實的宋王臺地景寫作，詩詞均未以「宋王臺」爲題，詩句也不見「宋王臺」一詞。由此看來，對於宋王臺的考證與書寫，雖可看做陳伯陶對既有的厓山書寫傳統的延續，但陳伯陶以宋王臺爲標誌所進行的景觀維護與重建，詩文論述與題詠，由此在民初香港興起另一波的宋王臺熱潮，顯然已不同於對厓山記憶的個別抒懷，而展現了避居香港的遜清遺民的群體意志和政治心聲。陳伯陶在民初重塑南宋小朝廷的流亡地景，推斷九龍侯王廟乃供奉護駕忠臣楊亮節，擴大追認宋帝駐蹕九龍的遺址，以此宣示一個曾在九龍地區登場的流亡政權傳統，箇中的政治姿態不言而喻。這些對地景的命名，透過廣邀前清耆舊雅集題詠，一種帶有儀式性行爲的遺民論述於此完成。這大概可看做陳伯陶在殖民地香港的「傳統的發明」，一個在現代情境下遺民視域的「地景發現」或「發明」。當與舊傳統相適宜的社會模式招致摧毀和破壞，舊傳統已難以適應新社會模式，就是傳統的發明出現的重要契機。因此，對歷史遺跡進行文化考古，將遺民記憶銘刻於景觀之中，就是陳伯陶等清遺民在避地香港，重新對文人傳統和民族身分的發明與確認。[28] 這種儀式性的行爲集中體現在文人、遊客登覽宋王臺後，以九龍、宋王臺懷古爲主題的詩篇大量湧現。這跟陳伯陶等人最初在宋王臺的祭祀和題詠，以及《宋臺秋唱》的輯錄出版大有關係，也間接促成了以宋王臺爲主的九龍宋代遺跡，成爲表徵南宋史和遺民節氣的正牌地景。[29]

承，左鵬軍對相關文獻做了初步勾勒。左鵬軍：〈厓山記憶與嶺南遺民精神〉，發表於「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8-9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28] 關於九龍地區從清代、殖民統治到戰後跟宋史關係的追述和確認，其中的發展歷程可參考鍾寶賢：〈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 1-29。本文提出的「傳統的發明」隱然可以跟該文篇名呼應。相關論點的啓發來自於（英）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蘭格（Terence 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

[29] 民初以降大量題詠宋王臺（含二戰後設立的宋王臺公園）、楊侯廟的詩歌，可參見方寬烈：《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另外，還可參見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頁 246-2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丙辰年九月十七日（1916 年 10 月 13 日），陳伯陶剛完成《宋東莞遺民錄》的編纂，故以敬祝宋遺民趙秋曉[30]生日爲由，召集同屬前清遺民的文人，齊聚宋王臺下舉行遙祭。遺臣耆舊聞風而來，題詩酬唱，弔古以況今，[31]卻成功替宋王臺的南宋正統和精神賦形。這明顯延續了明、清以來在厓山設立大忠祠、全節廟，並定期舉行祭典和祭陵儀式的傳統。但不同的是，厓山有設立紀念性的建築物和趙族宗親的輪值致祭，九龍宋王臺除了一塊巨石，其餘的南宋遺跡僅屬遺址。因而巨石在某個程度上可視爲南宋遺跡廢墟型態的轉化，以粗糙的巨石，兼以象徵崇高政治權力的「宋王臺」刻字。[32]「臺」在東周、秦、漢以來都是作爲政治或權力象徵的建築體，無論是宮殿和墓室的高臺建築，有其宏偉，展示權威的意義。[33]如今陳伯陶在一塊稱爲「宋王臺」的巨石前進行祭祀儀式，且以遙祝宋遺民的冥誕爲主題，巨石因此成爲遺址的某種凝固，再點綴遺民文人的題詠，眞正讓宋王臺的崇高意義得以發酵。於是，「宋臺秋唱」的意義不能僅僅視爲詩人雅集，巨石的紀念碑性質的完備，還有賴於這群遜清遺民的抒情言志。巨石成了九龍宋史的最佳物證，因爲其背後是一個文人、遺跡、流亡意識、夷夏之辨交匯而成的一個集體。這裏值得我們追問，「宋臺秋唱」如何形塑和加工完成這樣一種集體的想像。

在宋王臺下雅集的隔年，蘇澤東輯錄《宋臺秋唱》（1917）出版。當初刊

[30] 趙秋曉（1245-1294），名必瑔，字玉淵，號秋曉，宋東莞遺民詩人，曾倡議勤王，鼎革後歸隱。陳伯陶編纂的《宋東莞遺民錄》，開篇即爲趙必瑔。此傳記資料同時附錄在《宋臺秋唱》。傳記內容如此描述其遺民形象：「足跡不入城郭，惟西走大奚，東走甲子，短衣敝笠，徘徊海岸，不挾一童。每望厓山，則伏地大哭。又畫天祥像於廳事上，朝夕泣拜。」參陳伯陶纂：《宋東莞遺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412-413。

[31] 參見蘇澤東：〈宋臺秋唱序〉，《宋臺秋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

[32] 一個有趣的對照是，厓山也有一塊奇石，相傳是叛將張弘範滅宋後在奇石上刻有「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數字。後奇石被炸毀，1960 年代劇作家田漢重新題刻新石碑，碑文改爲「宋少帝與丞相陸秀夫殉國於此」。明清以來有數篇題詠奇石的詩篇，但厓門奇石始終不如宋王臺巨石的象徵意義，後者幾乎是民初以來題詠的焦點。

[33] 關於「臺」在中國古代建築上的意義，可參考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頁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的版本共有兩個，分別爲陳伯陶的聚德堂叢書版本，[34] 以及粵東編譯公司版本。兩個版本收錄的詩文順序和數量皆有出入，前者作者 35 人，後者作者 53 人。[35] 這是遺民文人群體的集體題詠酬唱宋代遺跡的詩歌合集，更可以看做一本追認九龍宋代遺跡的地景／地誌書寫。他們對遺跡的細緻品味、追憶歷史，進而在懷古的哀傷裏，寄託幽思，以文學的暖光賦予這些遺址和遺物古典光暈。因此，《宋臺秋唱》標榜的是「凡涉宋事暨居九龍留題唱和之詩，輯成斯集；而古官富場之舊聞新詠，乃流播人間，名蹟始不終秘」（梁淸〈宋臺秋唱跋〉），但同時兼具「述一代之遺徽，維千秋之名教，非敢詡詩人好事；而地以人傳，輒欲附驥，垂不朽耳。」（蘇澤東〈宋臺秋唱序〉）的願望。換言之，純以遺民詩人的懷古之作看待，也許小看了《宋臺秋唱》在民初香港文學的特殊意義。它不僅表徵了南遷遺民的中原眼界和憂憤，卻同時認知九龍地域作爲避地，進而安身立命的所在。追認宋代遺跡，賡續正統，也同時重新命名了英殖民的九龍地域對這批南來文人的深層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九龍宋史的核心內容，乃是南宋末二帝的南遷。帝王群臣流亡路線上的據點，恰恰是一個又一個生發想像慾望的遺址。這些人文地景記載著曾經在場的歷史，[36] 那必須被召喚的餘光和記憶，詩人懷古式的題詠做了

[34] 1979 年潘小磐將蘇澤東輯錄的《宋臺秋唱》和陳步墀《宋臺集》合併刊印，成爲目前通行的版本。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據此版本重印，書名《宋臺秋唱》。此版本收錄的《宋臺秋唱》乃聚德堂叢書版本。除特別註明外，本文引述的《宋臺秋唱》詩文以此版本爲主。若引述自粵東編譯公司版本，將標示粵東版。

[35] 該次雅集實際參與人數和形式已無法確認，僅知數十人。但作者人數不等同雅集人口，兩個版本皆有沒參與雅集而奉寄酬答的和詩，也有早於 1913 年陳伯陶偕同吳道鎔、張學華、賴際熙等訪宋季遺跡的詩作。兩個版本除了收錄作者人數不同，在粵東編譯公司版本中，還特別收錄《宋臺圖詠》的唱和詩篇，更完整呈現了詩和圖並置的宋臺秋唱原始脈絡。《宋臺秋唱》共分三卷，首卷爲祭祀趙秋曉生日的詩詞，次卷聚焦詩人們對宋王臺的懷古之作，終卷乃陳伯陶和遺老們的交際贈答之作。

[36] 歷史的「在場」除了可供文學追憶，也有人文消費的魅力。在 21 世紀的今天，南宋末二帝的南遷路線，竟也成爲一條廣東旅遊觀光規劃路線。參見蘇英、肖星：〈以南宋末帝南逃之路爲依託，開闢特色文化旅遊線路〉，《旅遊縱覽》（行業版），2011 年第 3 期，頁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儀式性的還原。題詠遺跡，就是歷史物質性的遺存透過唱和詠歎去追捕那已然消逝的時光，卻同時保持必然已逝去的現實。那是詩人題詠的動機，意圖捕捉歷史遺跡，以物質性的見證賦予「歷史」的在場。我們從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就能看出詩人題詠宋代遺跡的基本格局。該詩先以序文清晰勾勒宋末二帝的流亡路線，從梅蔚、官富場、淺灣到碙洲幾處地名的座標位置，調動《南宋書》、《宋史》、《新安縣志》、《元史》等多種史書地誌，反覆證成九龍作爲古官富場地，就是端宗昰的駐蹕之所，而宋行宮的殿址猶存。[37] 從帝王遺址的確立來驗證自然地景，所謂「其地東南有小山，瀕海上有巨石，刻曰：宋王臺」就變成了不容質疑的歷史記憶的「現場」（site），而將「今惟厓山最著」的行宮殿址，直接指稱「茲地改稱九龍，世罕有知之者矣」，可以看做是作者考證所得的尋古。事實上，宋王臺僅屬巨石，殿址早已看不到，歷史記憶的「現場」是陳伯陶以詩激盪而出的主觀空間感：「茲臺兀立海裔孤，西望厓山血模糊。化爲朱鳥張其咮，海潮不起群噍呼。皋羽所南足跡絕，遺黎老死云誰吁。」詩句動容地描述不會再有人想起宋代謝翱、鄭思肖這些聽聞文天祥死訊而慟哭的忠心遺民，而今我輩更屬被棄置的遺民，老死也無人聞問。於是陳伯陶詩裏迴盪的遺民思緒，來自於序的敘事框架。宋王臺、厓山被認知爲端宗的最後流亡地，那是南宋消亡前的地景。宋王臺透顯的「廢墟意識」，[38] 恰

[37] 陳伯陶的論證其實頗爲素樸，如直接解讀梅蔚就在新安縣界，碙洲即今之大嶼山，以期營造端宗生命的最後時光皆在九龍地域。但這些史籍和地圖上的地名在學界仍有爭議，正反支持的意見都有。相關爭議詳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頁 122-174。饒宗頤：〈碙洲非大嶼山辨〉，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頁 175-186。葉靈鳳前揭文〈港九的南宋史蹟〉也做了史籍資料的考證和補充。

[38] 這裏的「廢墟意識」，轉化自巫鴻對「廢墟」、「墟」等概念在古詩和畫裏的討論。他強調「墟」更多被想像爲空曠空間，那不是通過可以觸摸的建築殘骸來引發觀者的心靈和情感激盪，那是一個空的場，特殊感知的現場。參見巫鴻：〈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時空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恰是「茲臺兀立」的定點凝視，對一個或已消失不見，或虛擬爲臺的巨石，以石質的紀念碑式的粗糙實體來懷想一個已不存在的南宋氣象。宋王臺因此是有著特殊時間性的「遺跡」，賦予了「懷古」的正當性。

（二）跡與物：遺民的抒情

相似的懷古寫作，在面對已沒有建築殘存基座的宋行宮遺址，陳伯陶採取了考古田調式的挖掘。李景康記錄保全宋王臺遺址事蹟，仍不忘寫上老師曾經告知的考掘事蹟：「一日策仗宋臺隣近，見農人鋤地種植，發現破碎古瓦不少，乃僱土人二三名，往臺下海灘細爲搜尋。歷時三日，幸獲完整瓦瑫一具，花紋粗樸，作赭墨色。」突顯遺老們保全宋王臺背後有一種面對出土歷史的情懷。[39] 陳伯陶有詩表徵了這樣的情結：

> 官富場前宋行殿，荒村廢址青蕪偏。野人耕地得遺瓦，赭黝相兼餘碎片。赭如烈士歃赤血，黝似侍臣森鐵面。當時燔埴善陶甄，卻比範銅經冶鍊。……可憐宮瓦碎慈元，遑問故都杭與汴。君不見漢代鴛鴦裁作枕，魏家銅雀鐫爲硯，延年益壽辨當文，萬歲千秋趕奔電。淒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娑，惆悵遺基淚如霰」（〈宋行宮遺瓦並序〉節錄）

對實物出土的把握，可以作爲歷史遺跡的復活。這對行宮遺瓦的賦詩歌詠，重構的是對宋季符號的召喚。宋行宮的「殘餘斷片」讓詩人發思古之幽

[39] 此說是否可靠尚有疑義。陳伯陶在〈宋行宮遺瓦並序〉裏陳述「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塿樸，然頗經久。」對照《新安縣志》：「丁丑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時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建北帝廟。」似乎有意驗證北帝廟就是行宮遺址。此存疑點至少有二：一、宋帝駐蹕時間短暫倉促，不可能大興土木而有磚瓦建築之堂皇宮殿樓臺。二、二王殿村上的北帝廟乃開闢市區改建重修而成，非二王行宮故址，石礎和遺瓦不可能復得。前後疑點參見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頁 144-145。黃佩佳：〈九龍宋王臺及其他〉，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頁 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遺物」賦予「遺跡」的實體感，從宮瓦到行殿，再到汴杭故都的想像連結，讓眼前地景結構化爲一種抒情意識，以物激盪歷史悲情。在南宋的「荒村廢址」上，陳伯陶藉物縫補歷史的碎片，宋行殿的「遺跡感」既可以拉開今昔辯證的時間性，也同時讓眼前九龍避地的前清遺老，綰結歷史和文化的渠道，在文化遺民的視域下，替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憑藉。南宋覆亡和清室垮臺本不該相提並論。在夷夏之辨的前提下，前者是漢人政權被侵吞，後者是異族政權的淪亡。但對已處身「蠻夷」避地的陳伯陶而言，對宋行宮遺址的感傷鋪敘，不過是讓九龍成爲遺跡般的追憶場所，在復活宋帝南渡歷史之際，以行宮遺址建立的象徵地理，同時替一個新近的消逝政權悼亡。陳伯陶在英殖民地的九龍，詠南宋遺跡以澆忠清之塊壘，等同在進行另一種的夷夏之辨。遺民眼中的遺跡敘事，追求的效果是「以延續哀悼的形式表達持久的忠誠」。[40] 因此他透過遺民正統的確認，代換了漢人或異族政權的認同矛盾，在九龍締造出宋史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41] 箇中的中國元素，改寫了九龍的地方意識，進而改造了九龍作爲遺民避地的意義。

陳伯陶的詠物抒情，追認遺址，摩娑遺物，這裏創造的詩意，陷入「戀物」般的歷史幽情，並爲宋王臺周邊的遺跡建置了文化風景。換言之，陳伯陶在詩序裏陳述對遺瓦的「挖掘」，重點並非考古而是審美。從詩的結尾「惆悵遺基」看來，歷史劫灰下的遺民人生，才是進行南宋遺跡的審美書寫的初衷。宋王臺、宋行宮等遺跡的詠物和懷古書寫成爲《宋臺秋唱》的核心主題，不也說明了宋代遺跡也是他們心中的地理遺跡。當然，陳伯陶透過遺物詠史，並非特例。南社詩人高旭偶得明孝陵磚瓦，還仔細斫成硯盤，且在詩裏傾訴了眞誠

40 參見巫鴻：〈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頁 71。

41 這裏借用傅科的異質空間概念，旨在強調遺民對九龍宋史的文學和歷史敘事，可以在遺民生存和殖民地的文化與日常空間層次上，有了重新討論九龍地域文化的意義。王標也曾藉此概念討論民初時期上海租界裏遺民生活。參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遜清遺民〉，《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 1 月），頁 33-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且憂傷的睹物思君情緒。[42] 在天翻地覆的鼎革前後，他們都在採集文化或傳統文明的遺物。

清末民初以來，透過追認、收集、輯錄前朝文人遺稿、蒐羅遺物以坦露忠誠意識，懷舊心志者，自不在少數。這姑且可視爲寄託前朝情懷，或作爲廣義文化遺民的懷古。其中又以登臨遺跡、謁訪陵寢、修禊集會、紀念生日忌辰者，最能表現其中的儀式性。但謁訪帝王陵墓，卻更帶有一種賡續正統的意味。辛亥革命後，末代清帝溥儀退位後，孫中山隨即率領官員謁明孝陵，並發表〈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兩篇文告，展現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光復漢室」的成果，隱然賡續的正統，乃是夷夏辨別的民族正統觀。而早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南社詩人多有透過輯錄明末烈士遺集、謁陵掃墓、蒐集遺物等儀式性的紀念行爲，擇取宋代烈士岳飛、文天祥、謝翱、鄭思肖，明代烈士陳子龍、張蒼水、瞿式耜等人，作爲詩的表徵對象，以建立遺民思維的內在典範，寄存心志。[43] 然而清末民初南社諸子和遜清遺民的謁明陵的行爲，既可說明「晚明想像」背後面對文化與君國的進退應對的立場，[44] 當然也少不了林紓、梁鼎棻等遺老謁崇陵的忠清意識。這些在歷史大裂變下的儀式性作爲，箇中的抒情和想像，都有不同的姿態。

透過《宋臺秋唱》，我們看到遺民詩人對宋季遺跡的題詠，恰似以儀式性觴詠酬唱來重複命名地標，形塑地景，同時寄託對「趙氏塊肉」[45] 的歷史喟嘆。但遺民不世襲，眼前的隔代懷古，不過是對應詩人當下心事。我們從更

[42] 高旭：〈得孝陵磚一方，斫爲「日月重光硯」，紀之以詩〉，收入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131。

[43] 相關討論詳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407-433。

[44] 關於「晚明想像」在遺民文人的意義和展示，參考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26-160。

[45] 這幾乎成爲題詠宋王臺及周邊遺跡的詩作慣用的意象或關鍵詞。此事典出自《宋史・本紀第四十七・瀛國公（二王附）》：「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宋遂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對宋王臺的懷古詩篇裏，看到歧異的地理辯證，和歷史情懷。

有賴太史之稱的賴際熙（1865-1937），曾任國史館總編修。他與陳伯陶多次遊訪宋王臺，對宋王臺表徵的遺民道統，他的體認釋放出不同的意涵。〈登宋王臺作〉就有如下詩句：「九州何更有埏垓，小絕朝廷此地開。……宋道景炎明紹武，皇輿先後總南來。」他放眼中國歷史上的南渡，丟失了廣袤國土，只剩退卻絕地的小朝廷。但此南渡說的已是國境之南的廣州，甚至九龍。從南宋端宗到南明唐王，皇室正統被迫遷往南方邊陲之地，且帝王最終死在南方。而他們這批前清遺民的南渡香港，不過就是傳統的延續，大時代下的流離遷徙。但遺民眼界不盡是愁苦悲思，他對眼下的九龍和香港位置卻若有所思：「大地已隨滄海盡，怒濤猶挾故宮移。殘山今屬周原外，塊肉曾無趙氏遺。」詩人表面寫的是宋王臺的臨海地勢，怒濤拍岸，但實指宋季遺址已在國境之外。九龍香港的割讓，清室覆亡，在時代的大變動下，那已不見蹤跡的行宮，投海殉國屍首不存的宋帝趙昺，也將被人遺忘。賴太史替自己的遺民身世悲從中來，懷古的同時，已洞見殖民地的歷史曖昧。

於是，我們陸續在宋王臺的懷古詩篇裏，讀到這些詩句：「外人尚解尊王意，石檻深深護古臺」（黃瀚華〈宋王臺〉）、「名蹟他邦重，遊人噬肯來」（梁淯〈丁巳春與蘇選樓君重登宋王臺次韻同作〉），詩人們表達了英殖民者尚且理解華夏古蹟的意義，對照早前廣東和香港地區漢人對此宋代遺跡的漠視。這符合宋王臺最早被英殖民政府訂爲古蹟立法保護的事實，自然也呈現了在殖民地憑弔中原遺跡的複雜感受。巨石儘管銘刻宋王遺跡，但古代的官富場轉眼已成英國人殖民統治且開發的地區。方啓華詩句裏的「巨石不隨炎宋去，孤城竟任外夷來」（〈丙辰登宋王臺歸謁楊侯廟次蘇君選樓原韻〉），提醒遺跡和英殖民統治之間隱藏的夷夏之辨。有的詩人更直接道出：「地占島夷誰作俑，招魂古帝有啼鵑。江山半壁尋遺跡，宋壤名存境已遷。」（蘇航〈敬步蘇君選樓遊宋王臺詩原韻〉）詩人肯定了古遺跡的文化召喚意義，但畢竟已事過境遷，國界和時代且已變異。詩人題詠之餘，已在突出個人對於眼前土地的認知和安身立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澤東輯錄的《宋臺秋唱》大體都能印證遺民的懷古幽思。但蘇自己對箇中的夷夏之辨，顯然若有深思，感觸甚多。他在詩裏如此寫到：「河山大好屬他人，馮夷助虐誰問津。南溟鎖鑰失所恃，可憐桑海揚胡塵。」（〈龍津望海感賦〉）正視香港已屬英殖民地的同時，「南溟鎖鑰」說法已著眼地緣政治下對中國戰略位置的認知。遺民視域已不完全是傳統的夷夏觀，多了外交知識的調整。於是，他的詩句另有辯證：「片壤鎮南溟，華夷此地經」（〈丁巳孟春偕梁君又農重遊宋王臺賦此索和〉）言下之意，陳伯陶等人對宋王臺的考證和「命名」，從此奠定了一個中原正統的意義。這是對自我遺民位置的確認，卻也立下夷夏之辨的標竿。這是遺民在殖民地形塑和尋求的某種地方感，對亡宋的烈士正氣和正統的重新確立，由此奠定自己避居殖民地的正當性。

殖民地九龍是宋季遺跡改變不了的外在布景，蘇澤東的夷夏觀也隨著展示現代觀。他在詩裏寫到：

> 嶙峋石聳翠維巔，回首諸陵一惘然。夷夏竟教分碧海，蒼桑底事問青天。雲屯廢壘埋荊棘，日落荒山叫杜鵑。撫碣何曾能滅宋，尚留片壤紀南遷。（〈丙辰春偕葉君楚白方君拱垣黃君昆式遊宋王臺作〉之二）

換言之，以宋王臺爲地標的巨石，完成了華人集體意識的凝固，表徵的南宋遺址在此轉化爲南來的離散遷徙，藉由強調南宋記憶的不曾滅絕，以體現依然被賡續的漢人正統。因此，詩人客居九龍避地，卻也可以找到樂土：

> 間關百戰臣心瘁，憑弔千秋客夢孤。誰謂窮荒非樂土，漁歌樵唱笑相呼。（〈官富場懷古〉節錄）

蘇澤東替宋王臺「懷古」下了最實際的註腳。但遺民詩學裏的典事成辭依然可見，「殘山賸水」就是關鍵詞：

> 君不見海陵舟覆殉節多，天水蒼涼可奈何。人去臺空閃斜照，寒潮聲和離黍歌。賸水殘山地竟棄，青天碧海情遙寄。樂土何陋願居夷，登高尚說前朝事。我來訪古九龍城，摩娑遺刻書崢嶸。欲補嶺南金石錄，風雨難磨千古名。……（〈登宋王臺懷古並序〉節錄）

儘管鼎革遺恨仍在，但細看詩人對眼前殖民地景的觀察和感受，已不純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過去遺民論述裏對「南宋／晚明」的殘山剩水的記憶和詩學表述。[46] 借景懷舊以傳達歷史哀思已不是首要的情緒。這些廣東一帶的遜清遺民，因爲避居香港的際遇，有了重新表述和建構廣東文化和歷史脈絡的契機。從「君不見海陵舟覆殉節多」擴大厓山記憶的戰場遺址範圍，就知道歷史事實並非最爲重要。儘管宋王臺不是宋元大軍激戰的最後戰場，卻可以將戰場記憶與一塊巨石內置在亡宋的記憶結構，由此替亡宋的戰場遺址提供了有效的紀念景觀（landscapes of commemoration）。因此九龍城作爲歷史遺址的疆界，「樂土何陋願居夷」就辯證提出詩人安居殖民地的事實。詩人「欲補嶺南金石錄」，刻意強調宋王臺代表的紀念碑位置，必須作爲歷史紀念物加以保存，唯有透過「摩娑遺刻」才能梳理並合理化從廣東流放到九龍的避地情懷。這些對帝王駐蹕／亡宋戰場遺址的題詠和闡釋，給九龍的整體景觀帶來重要變化。在保存嶺南記憶，重現地域風雅的同時，殖民地有效提供了我們對嶺南地域的民族性投射。與其單論遺民悲情，這群詩人更多了一分對眼前殖民地的「地方」辯證。他們恰恰在殖民地香港重建了「廣東」想像。宋帝南遷的逃亡路線，探究的不僅是亡宋情懷，或追憶中原正統。他們同時藉宋帝流亡和覆滅的遺跡，表徵了一個帶有地理意識和文化道統的廣東文化。

《宋臺秋唱》的編輯出版，對宋王臺及相關遺跡而言，是「文本的紀念碑」的完成。藉由敬祀宋代東莞遺民趙秋曉生日的詩人雅集，連結宋王臺背後南宋小朝廷的廣東流亡地理，詩人環繞宋季遺跡的觴詠酬唱，使《宋臺秋唱》有效維繫和形成一個以東莞、港澳爲核心的傳統文人的社交網絡。他們在南宋正統和宋季符號的文化想像經驗裏，合法化了傳統文人群體中的遺民特質和離散身分。詩的文學手法和歷史想像，重新賦予廣東和九龍宋史的文化厚度，南宋遺跡也因此被嵌入九龍景致。一般討論民國時期港澳傳統文人的人文活動，

[46] 關於江南士人在書畫和詩詞內對「殘山剩水」的表述，參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第一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受關注的就是 1923 年在香港買地購屋創辦學海書樓。他們仿照廣東的學海堂，意圖在香港復興學術道統，推廣國學教育，表現一種強烈的文化意識，被視爲以廣東爲認同基礎的一種地域文化。那是嶺南學風的延續，形成「廣東文化」的一環。[47] 但我們可說《宋臺秋唱》代表原籍廣東的傳統文人集會題詠，以及引發的後續酬答遙和，更早說明了對廣東和香港的文化地理的反思。《宋臺秋唱》因此是民初廣東／香港傳統文人的社會網絡的物質性載體，對應以巨石爲物質「遺跡」的宋王臺，在南宋流亡朝廷的遺址上重塑跨入殖民地的文學空間。

四、畫與詩：「宋王臺秋唱圖」的地景圖繪

若《宋臺秋唱》代表著香港漢詩視域下的遺民地景，那麼集子卷首收錄伍德彝（1864-1927）[48] 畫作「宋王臺秋唱圖」就值得注意。該畫有題跋，[49] 編輯蘇澤東隨即有〈自題宋臺秋唱圖〉詩作附和，後續引發眾多的和作，促使蘇澤東在 1922 年另編輯《宋臺圖詠》出版。在這數年間以宋王臺爲主題的詠唱，在遺民群體內構成了特殊的氛圍和空間。尤其畫作的題詠及和作得以單獨出版，代表在詠詩酬答之餘，詩人對畫與詩另有不同層面的互動和交疊。另外，《宋臺秋唱》出版隔年，向陳伯陶執弟子禮的商人陳步墀（1870-1934）

[47]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64-212。關於學海書樓的沿革和發展，參見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

[48] 伍德彝，字懿莊，號逸莊。祖籍八閩，寄籍南海。廣州四大望族的名門之後，也是廣東畫壇名師居廉的弟子。在居氏眾多弟子中，伍德彝的名氣響亮，地位甚高。能詩詞，好金石考古，精於鑑別書畫，擅於國畫和書法。由於家境富裕，收藏許多書畫和珍奇古玩，常在私人園林萬松園舉行雅集。晚年失明，家道中落，1914 年曾短期避亂香港。

[49] 不知何故，聚德堂版本附錄的〈宋王臺秋唱圖〉並沒有題跋詩，而粵東編譯出版公司版本的〈宋王臺秋唱圖〉則附上題跋詩和八家和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輯《宋臺集》（1918？）[50] 也隨即出版。從《宋臺集》的書名，其延續遺民心志不言而喻。除了收錄陳步墀訪陳伯陶、以及伴友重登宋王臺等詩作，還有賴際熙、陳伯陶等人墨寶，同時收入數張遺民文人在宋王臺前，以及遊宋王臺後在曾兆榮暢齡室合照共飲的雅集和遊樂照片，具體投影了當年遺民群體間的交遊實況。此書另有一幅「宋臺秋唱圖」，畫者爲劉揚芬。

綜觀伍德彝和劉揚芬的兩幅畫作，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前者著眼宋王臺的山陵景致，蒼茫間依稀可見詩人登臺遠眺，長空昏鴉。整體突出山丘禾黍的蕭瑟風景。相對於此，劉揚芬「宋臺秋唱圖」則是景深開闊的小橋流水、騎驢遊人和村民活動的鄉間景致。宋王臺則遠矗丘上，一幅和諧的農村生活。兩種宋王臺的「風景」，間接說明二書背後作者、編者，以及避難香港的嶺南畫家落在宋王臺的不同視點。他們對宋王臺的「視覺」差異，不僅是「看」和「觀」的問題，更說明「觀」已接近於「世界觀」，涉及民初香港文人群體在所接觸、存在的世界中觀看，在觀看中成立世界的問題。[51] 換言之，「宋王臺秋唱圖」是一幅文人風景，根據「風景」的視景（land-scape）所界定，這也提示我們探究風景成立的條件。

劉揚芬畫作在陳步墀《宋臺集》裏突出的是民間視域，該書收錄詩作多屬贈別、訪遊範疇，呈現香港傳統文人交際生活中悠遊自在，自成格局的雅趣。這裏的田園景觀有意嵌入遺民自在安頓，另闢桃花源的潛在意圖。《宋臺集》的遺民世界是那麼怡然自處，九龍避地與遺民生存之間，不僅是追溯往昔，且多了一份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盼望。尤其書中幾張遺老們的遊樂合照，不就

[50] 《宋臺集》被編入陳步墀《繡詩樓叢書》第 21 種。至於《宋臺集》的出版時間，根據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登記，乃是 1917 年石印本。但黃坤堯教授編纂《繡詩樓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年）記錄 1918 年（戊午）。而鄒穎文編著《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又記錄爲 1919 年。《宋臺集》一書並無標示確切刊刻日期，但集內有戊午年間詩作和照片，則可以推斷最可能的出版年份當屬 1918 年，但仍有待進一步確認。

[51] 對於風景的哲思探究，可參考黃冠閔前揭文〈風景的哲學思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映襯了畫中世界的理想性。有鶴山女子馮文鳳對此畫題詠，其中「幾人結茅屋，樂國無朝夕」二句，著實指出了九龍遺民地景的另一番深意。

但《宋臺秋唱》內的伍德彝畫作卻另有主張。他大肆鋪展濃郁的視覺景觀以營構遺民意志。詩人藉畫的題詠唱和，在互文表述間更具體回應了宋王臺作爲「遺跡」的廢墟感，以及從中覓得一絲古典靈暈（Aura）——那隨著時代變異和裂變而喪失傾塌的傳統。畫以構圖的景深，穿透詩人題詠背後企圖把握的傳統氛圍和情感痕跡，同時藉詩的敘事框架，使畫內嵌了遺民詩人的感覺結構。從《宋臺秋唱》以伍德彝「宋王臺秋唱圖」爲卷首畫作，大抵已看到蘇澤東有意藉畫呼應詩人詠歎宋季遺跡，將廢墟感定調爲遺民生存結構的一部分。

當我們認知「宋王臺秋唱圖」是對宋代遺跡的「廢墟」意識的特殊處理，最直接的視覺構圖的衝擊，當屬那被凸顯於丘墟的宋王臺巨石。巨石下盡是荒蕪光禿的山丘，有一種丘荒之感。從古代以荒丘爲主題的畫作裏，學者巫鴻不忘提醒我們「丘的兩種含義——建築物遺跡和空虛（emptiness）的狀態——一起建構了一種中國本土的廢墟的概念。」[52] 粗糙的岩塊、禿頂的山陵，層次分明區隔出畫面下方茂密樹叢和錯落的房舍。整體構圖特以岩塊的厚重，投向宋臺秋唱的敘事框架，廢墟中的儀式性哀悼。這就不難理解，詩人們熱烈對「宋王臺秋唱圖」題詠唱和，恰是另類的地景圖繪（landscape mapping），將鼎革遺恨精準標的於畫卷之中。

離離禾黍故宮秋，羞見降旗出石頭。
終古難消亡國恨，怒濤嗚咽向東流。

漁樵閒坐話南朝，鴉點長堤柳拂橋。
繪出蒼涼天水碧，白頭詞客亦魂消。
（蘇澤東〈自題宋臺秋唱圖〉節錄，粵東版，頁 1）

[52] 參見巫鴻：〈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頁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疎林落日寫清秋，風景蕭騷聚筆頭。
一番畫卷增感喟，幽情弔古盡名流。

伶仃龍種覆南朝，悽見垂楊臥板橋。
如此江山足悲咤，荒臺王氣黯然銷。
（梁淯〈題宋臺秋唱圖次蘇君選樓韻〉節錄，粵東版，頁 2）

西風黃葉滿山秋，剩有荒臺占上頭。
太息香孩遺業盡，不堪憑弔涕橫流。

破碎河山草創朝，忍將往事溯陳橋。
故宮禾黍蒼涼甚，一縷魂隨畫卷銷。
（胡煥琦〈和蘇君選樓君題宋臺秋唱圖原韻〉節錄，粵東版，頁 2）

在以上的題詠中，宋王臺地景遭致封鎖，遺民時間停頓，在斷裂的時空瞬間完成宋臺秋唱的儀式性宣示。透過詩與畫的相互證成，《宋臺秋唱》裏的宋季廢墟依稀可見，恰似陳伯陶在〈宋東莞遺民錄序〉的抒情表述：

> 余嘗登宋王臺眺海山之蒼蒼，海水之茫茫。慨然想秋曉諸人往來丘墟禾黍間，未嘗不仰俯古今，爲之涕淚滂沱，而不能已已也。[53]

那是獨立於蒼茫間的遺民主體，往返丘墟間，在宋王臺思古尋跡，形塑一己在九龍避地的地方感。這幅風景也提示了民初香港傳統文人由於詩文、書畫才藝而獨具超然身分，他們在此新舊思想雜處的殖民地移動、感知、接觸所形塑環繞自我而成的空間。

[53] 陳伯陶纂：《宋東莞遺民錄》，頁 4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　論

《宋臺秋唱》呈現了以陳伯陶爲首的民初香港和廣東地區的遺民文人群體。[54] 南來作者和遺民身分交織的離散和懷舊敘事，命名地景也辯證歷史時空的變遷，可以看做最早切入殖民地香港的中英元素和空間想像的作品，締造了民初香港文學的關鍵時刻。

當年陳伯陶在宋王臺賦詩酬唱引發的遺民文人的集體唱和，不但是民國初年在香港的遺民文人營構的文學空間，以寄存亡國心志，卻也同時是遺民在香港九龍認知地方歷史遺跡，並賦予其歷史和文化紀念性意義的「命名」舉動。陳伯陶不但考據了宋王臺的歷史來歷，爭取在英殖民政府發展土地之際，保留了一處香港繼承中原歷史文化的遺跡，並成功在文化層面形塑了文學意義的「地方」。換言之，宋王臺的遺跡脈絡，不再是題字的巨石，也非清代《新安縣志》記載下宋末帝最後的駐蹕之地，恰恰成爲了遺民敘事裏最有效的文本風景。避難南方的文人藉此找到了文化根據地，在英殖民環境裏，形成了民初香港文學的另類值得觀照的文學和文化氛圍，一個戰前香港文學身世的重要起點。這是清朝滅亡後，香港殖民地回應民國新局和文化道統的具體案例，遺民文人有所本的張羅宋王臺敘事，表面盡是山河破碎的遺民眼界，然而回歸懷古敘事的弔詭，凸顯了避難移居九龍和港島的南來文人，集體介入和置身「地方」的舉動。九龍和宋王臺的歷史脈絡的重建，在《宋臺秋唱》找到抒情的氛圍和南宋想像。香港不再是傳統避地，而是延續中原政治道統的一個南方座

[54] 有的作者以眞名示人，有的以別號自稱。其中頗爲著名的幾位遺老他們常用的別號分別如下：陳伯陶（九龍眞逸、眞逸山人、厲人）、蘇澤東（選樓、祖坡）、吳道鎔（永晦、澹庵）、張學華（闇公）、張其淦（寓公、豫泉）、汪兆鏞（清溪漁隱）、丁仁長（松隱、潛客）、伍銓萃（登公）、賴際熙（智公、荔垞）等。文人別號的整理，見於梁淸：〈宋臺秋唱跋〉（粵東編譯公司版本）。潘小磐 1979 年將《宋臺秋唱》和《宋臺集》合刊出版，在跋也延續做了相似的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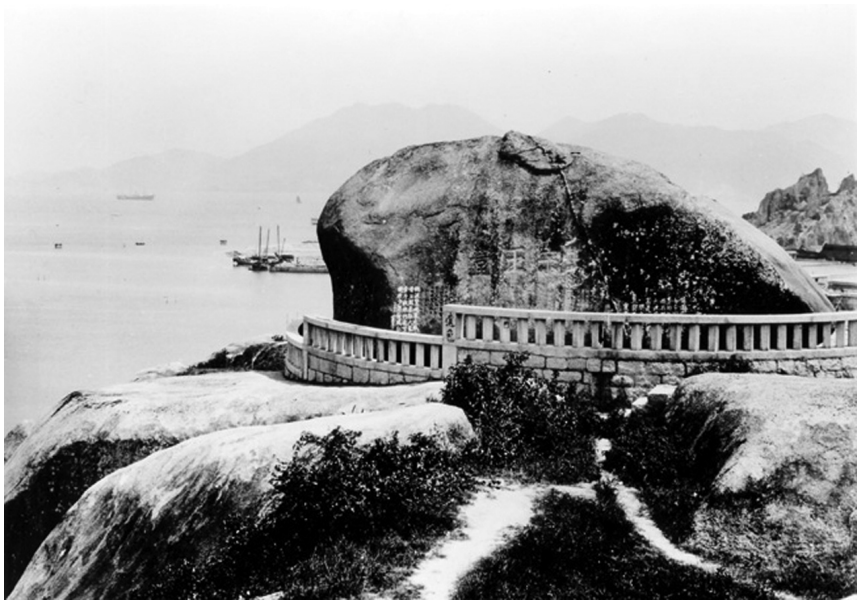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標。《宋臺秋唱》是香港文學最早刊行的雅集詩輯，也是早期南來文人最具代表性的詠史酬唱。其對宋王臺空間意義的封鎖，讓宋王臺在切斷的時間與空間裏，成了香港文學最早的紀念景觀。相對我們從黃谷柳《蝦球傳》（1947）、侶倫《窮巷》（1948）尋找新文學裏的香港意識和空間，《宋臺秋唱》不也揭示了漢詩在香港文學的現代意義。自此宋王臺的紀念意義不僅僅是公園性質的紀念標的物，[55] 而是《宋臺秋唱》傳承延續的民初香港文人對在地文化的意義脈絡的重建和想像，宋王臺既是歷史遺跡，也是遺民群體重新認知香港的「地方」（place）。

因此我們可以確知，陳伯陶等人對九龍宋季地景的發現和重申，提出了新的象徵，即是回到民初香港做爲殖民地的脈絡下，一批因辛亥鼎革南來的文人如何藉此尋回中原南宋遺跡而重新理解「避地」。我們藉此反思帝國邊陲的土地和島嶼，如何在帝國覆亡的時刻，由遺民之手「連結」到中原，替香港的南來文學補上一章土地和身分的辯證。當我們將陳伯陶等重塑的九龍宋史類比於一個「被發明的傳統」，恰恰並非否定南宋二帝駐蹕九龍的史實，而是強調民初時刻在中國現代語境內發生的民族主義、民族象徵，也因爲南來遺民在殖民地的身分和認同疑義，改寫了他們的地方感。殖民「避地」需要民族象徵，宋史遺跡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缺。當遺民愈是重申傳統的忠義觀，卻彰顯認同的遊移和辯證；歷史遺跡終究是廢墟，但他們同時落實了對九龍和香港的觀照。

[55] 日據時期，日軍以擴建軍用機場爲由，炸毀聖山，宋王臺巨石被棄置草叢。戰後，港府應趙氏族人請求，在啓德機場以西建立宋王臺公園（1960），將刻有宋王臺三字的巨石削成方塊，以紀念碑形式供遊客瞻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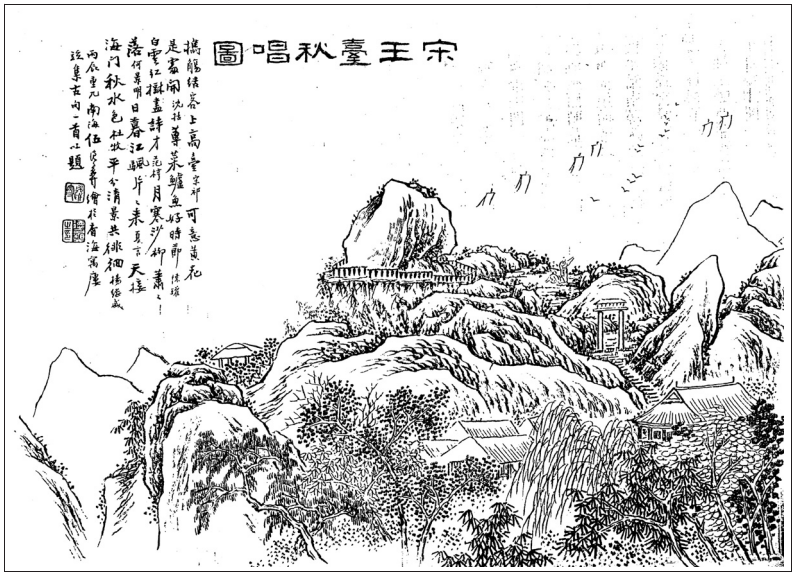


附圖一　宋王臺舊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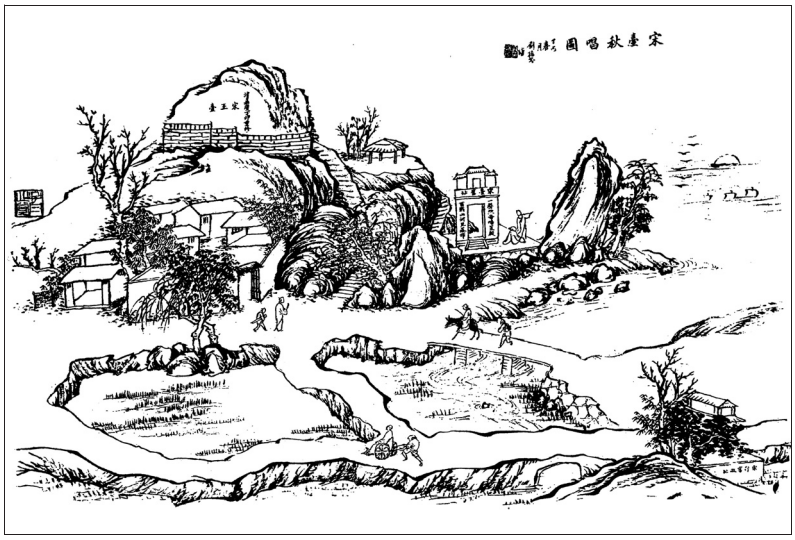


附圖二　宋王臺公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三　伍德彝〈宋王臺秋唱圖〉



附圖四　劉揚芬〈宋臺秋唱圖〉

（責任校對：傅凱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方寬烈：《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 年。

高　旭：〈得孝陵磚一方，斫爲「日月重光硯」，紀之以詩〉，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131。

張大年編選：《厓山詩選》，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

陳伯陶：《瓜廬文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

陳伯陶：《瓜廬詩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

陳伯陶纂：《宋東莞遺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陳步墀原著，黃坤堯編纂:《繡詩樓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年。

蘇澤東編：《宋臺秋唱》，不詳：粵東編譯公司，1917 年。（粵東編譯公司版本）

蘇澤東編：《宋臺秋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聚德堂叢書版本）

二、近人論著

王　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遜清遺民〉，《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 1 月），頁 33-42。

左鵬軍：〈厓山記憶與嶺南遺民精神〉，發表於「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8-9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巫　鴻：〈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時空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1-82。

巫　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李景康：〈紀賴際熙等保全宋皇臺遺址〉，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頁 264。

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 年。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高添強：〈九龍城地標之三：九龍城區史蹟概覽〉，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07-229。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5-93。

區志堅：〈學海書樓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頁 79-124。

張惠儀：〈粵籍遺老書法家與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書壇〉，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海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頁 145-166。

陳紹南編：《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香港：Auto Printing Press，1997 年。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黃佩佳：〈九龍宋王臺及其他〉，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頁 97-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冠閔：〈風景的哲學思路〉，發表於臺南藝術大學主辦：「文與體：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2012 年 6 月 25-26 日。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

葉靈鳳：《香島滄桑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

董就雄：〈陳伯陶忠義觀試析〉，《文學論衡》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32。

鄒穎文編著：《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

劉智鵬、劉蜀永編：《《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7 年。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鍾寶賢：〈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43。

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頁 122-174。

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 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

蘇英、肖星：〈以南宋末帝南逃之路爲依託，開闢特色文化旅遊線路〉，《旅遊縱覽》（行業版）2011 年第 3 期，頁 120。

饒久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 年。

饒宗頤：〈碙洲非大嶼山辨〉，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頁 175-186。

（英）伊恩・D・懷特著，王思思譯：《16 世紀以來的景觀與歷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 年。

（英）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景觀和歐洲的視覺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注視自然〉，凱・安德森、莫那・多莫什、史蒂夫・派爾、奈杰爾・斯里夫特主編：《文化地理學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70-388。

（英）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蘭格（Terence 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年。

Tapati Guha-Thakurta. *Monuments, objects, histories: institutions of art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說明**：書名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B.-T. (2008). *Gua lu shi sheng* [Chen Bo-Tao's collection of poems]. Taichung: Wen Ting Ge.

Cresswell, T. (2006). *Di fang: Ji yi, xiang xiang yu ren tong*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Wang Zh.-H. & Xu T.-L., Trans.). Taipei: Socio.

Huang, K.-Y. (Ed.). (2007). *Xiu shi lou j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Bu-Ch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Jian, Y.-W. (1960). Song mo er di nan qian nian lu kao [A study on the last two Song Dynasty emperors' exile to the south]. In Jian Y.-W. (Ed.), *Song huang tai ji nian ji* [Collected works in memory of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pp. 122-174). Hong Kong: Hong Kong Chiu Clansmen's General Association.

Luo, X.-L. (1961). *Xiang gang yu zhong xi wen hua zhi jiao liu*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ong Kong: China Initiative.

Su, Z.-D. (Ed.). (1981). *Song tai qiu chang* [Autumn chants on the Terrace of the Song Kings] (Ju-De Hall Series ed.). Taipei: Wen-Ha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yte, I. D. (2011). *16 shi ji yi lai de jing guan yu li shi*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 Beijing: China Building.

Wu, H. (2009). *Zhong guo gu dai yi shu yu jian zhu zhong de ji nian bei xi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Zou, Y.-W. (Ed.). (2011). *Xiang gang gu dian shi wen ji jing yan lu*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lassical writings of Hong Kong poets*]. Hong Kong: Chung Hwa.

Zhong, B.-X. (2001). Xu lun: Song mo di wang ru he zou jin jiu long jin dai shi [Introduction How do the last emperors of the Song Dynasty walk into Kowloon's modern history?]. In Zhao Y.-L. & Zhong, B.-X. (Eds.), *Jiu long cheng* [Kowloon City] (pp. 1-43). Hong Kong: Joi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